

南京大学史学丛书

崔之清 著

# 从传统到现代

近代中国史节点考察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大学史学丛书  
大学人文基金项目

崔之清 著

# 从传统到现代

近代中国史节点考察

Copyright© 2014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传统到现代:近代中国史节点考察/崔之清著. —北京:生活·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 2

(南京大学史学丛书)

ISBN 978-7-108-04415-0

I. ①从… II. ①崔… III. ①中国历史—近代史—文集  
IV. ①K25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91581 号

责任编辑 罗 康

封面设计 路 静

责任印制 李思佳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2014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 毫米×1020 毫米 1/16 印张 40.25

字 数 635 千字

定 价 98.00 元

## 百年传承铸学魂(总序)

南京大学历史系有两个源头。

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两江总督刘坤一邀请张謇、缪荃孙、罗振玉等商议办学事宜,旋即上《奏陈筹办学堂情形折》,其中称“江南地大物博,素称人文渊薮。省会高等学堂规模必求宏敞,俾可广育人才”,是为三江师范学堂开办之始。刘坤一未几即病逝,其继任者为洋务派名臣张之洞。张之洞再上《创办三江师范学堂折》,清廷准奏。1903年9月,三江师范学堂在前明南京国子监旧址开学,设有历史科,学制4年,此为南京大学历史系之肇始。之后,历经两江师范学堂国史科、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史地部历史科、东南大学文理科史学系、中央大学历史学系等阶段。

1888年,美国基督教美以美会在南京干河沿创办了汇文书院(The Nanking University),由学贯中西的美籍加拿大传教士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担任院长。1910年,汇文书院合并位于南京的另一所美国教会学校宏育书院(1907年由基督书院和宏智书院合并而成),金陵大学堂(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因此正式成立。金陵大学建立之初即设有历史学科。

自1903年至1949年,历经47年,南京大学历史系从蹒跚学步的婴儿成长为英俊彪悍的壮汉,虽历经风雨,但其长期积淀形成的学术传统赓续不断,蜚声海内外。1952年院系调整,原中央大学史学系、边疆政治系和金陵大学历史系合并,形成现

今学术底蕴深厚的南京大学历史系的基本学科架构。

110年来,南京大学历史学大师辈出,柳诒徵、徐养秋、陈汉章、雷海宗、郭廷以、朱希祖、金毓黻、沈刚伯、贺昌群、缪凤林、蒙文通、商承祚、韩儒林、王绳祖、蒋孟引、郑鹤声、贝德士(Miner Searle Bates)、陈恭禄、陈登原和王伊同等,为南京大学历史系“严谨求实”学风的确立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南京大学历史系培养的学生已超过6000人,其中本科、专科生逾4000人,硕士、博士研究生2000余人,他们或为学界翘楚,或为政界精英,或为商界巨擘,群星璀璨。如1923年毕业的南高师国文史地部第三班,即走出了著名史学家缪凤林和向达,著名地理学家胡焕庸和张其昀,以及著名图书馆学家陈训慈。此外,著名历史学家束世徵、郭廷以、王聿均、唐德刚、吴天威、章开沅、李时岳、王觉非、蒋赞初、茅家琦、梁白泉、张宪文、陈得芝、魏良弢等,均为本系毕业生。

学衡派是南京大学历史上最有影响的学术流派,而历史系教授则为其学术中坚。柳诒徵先生所阐述的《学衡》杂志宗旨为“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sup>①</sup>在《学衡》杂志的旗帜下,一群以本国固有文化为根本的学者,展开实证研究。对于国学,他们主张“以切实之工夫,为精确之研究,然后整理而条析之,明其源流,著其旨要,以见吾国文化,有可与日月争光之价值”;对于西学,他们主张“博极群书,深窥底奥。然后明白辨析,审慎取择”,反对“道听途说,呼号标榜,陷于一偏而昧于大体”。<sup>②</sup>学界对于学衡派“攻击新文化运动”、“复古倒退”的传统定论显然并不公正。现在看来,学衡派所倡导的兼采中西文化之长的观点,倒是显得更加理性。历史已证明,《学衡》杂志及学衡派的主张和追求,在近现代中国学术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地位。学衡派的为学宗旨和治史方法,在南京大学历史系也得到了了一定程度的体现。

1952年院系调整后的南京大学历史系,历经政治运动的冲击,师资与学科结构遭受了重创,但学术传承却从未间断。在韩儒林、王绳祖、蒋孟引、陈恭禄、王棣、刘

① 《学衡杂志简章》,《学衡》第1期(民国十一年1月)。

② 《学衡杂志简章》,《学衡》第1期(民国十一年1月)。

毓璜、洪焕椿、茅家琦、王觉非、蒋赞初、陈得芝、魏良弢、蔡少卿、张宪文等一批著名学者的引领下,形成了今天的学科结构与科研格局,也源源推出了影响中国史学进程的良好佳作。

为推动学术发展,总结南京大学历史系学术成果,激励南京大学历史系学人潜心治学,我们编集了这套《南京大学史学丛书》,以图继往开来,克绍箕裘,将南京大学历史系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必须强调的是,这批丛书仅仅是南京大学百年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阶段性成果的展示。

2010年4月20日,台湾润泰集团总裁尹衍樑先生与南京大学校长陈骏教授签署了“南京大学人文基金”的协议,由台湾光华教育基金会和南京大学“985三期”项目按照1比1.5的比例,共同出资人民币6000万元,资助南京大学的人文学科建设。《南京大学史学丛书》得到了“南京大学人文基金”的全额资助,谨此鸣谢。

陈谦平

2013年1月于南京

## 学境无涯 勤学慎行(自序)

—

2011年岁末,谦平主任告知,希望我能够出版一本自选文集,对此颇感犹豫和心怯。一是学问浅薄,缺乏底气,深恐贻误读者,故而心存疑虑,缺乏结集出版意愿。二是我所经历的学术环境长期盛行“左”的思潮,治学理论和方法难免存在偏误,虽然经过拨乱反正,自我修正,但意识形态影响难以根除,对学术研究的负面效应制约了著述的科学性。三是我国高等教育专业过细,学科之间封闭隔离,缺乏沟通和融合,历史学往往局限于文献整理、史实考证、史事陈述,与其他学科不相关涉,故而难以建构多学科分析框架,严重阻碍史学研究在理论、方法上的拓展和提升,学理内涵的深化颇为艰难。所以,我对选编和出版文集一直持保守和谨慎的态度,至今仍有惶恐之感。思虑再三,觉得出版文集可以回望笔者艰难崎岖的治学之路,透过这些著述的梳理和刊出,可以展现笔者治学的主要领域和成果,以及对若干研究课题的思考、探索和见解,并借此就教于学界同道,获取批评与指正,从中得到启迪和教益,俾可拓展笔者的治学路径,提升学术水平,因此,在惶恐之中,决定遵从主任嘱示,开始自选文集的编纂工作。

回首个人学习和治学道路,历经诸多坎坷曲折。1962年秋,考入南京大学历史

系本科,当时正是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我们经常下乡劳动,1964—1965年,去江苏海安参加历时10个月的四清运动。1966年春,南大文科整体搬迁至溧阳分校,停课劳动建校,6月,“文革”爆发,返回南大,参加运动,直到1968年秋毕业,去军垦农场劳动,接受解放军再教育。6年本科,真正在校学习时间只有两年多,因此,我们被冠以“文化大革命中毕业生”。1970年离开军垦农场,去中学、师范教书,讲授政治、语文、写作等课程,远离历史专业,教学负担颇重,每天忙于备课、上课和批改作业,而且学校地处偏僻城镇,既缺乏史学研究必须的图书和文献资料,也无暇从事学术活动。

1979年秋,我再度考入南大历史系,师从茅家琦先生,攻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方向是太平天国史。1981年底,通过论文答辩,遂留在历史系教书,才算走上治学之路,但已是不惑之年矣。这是我们这代学人的悲剧。所谓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缺乏严格、规范和科学的专业学习与训练,治学基础比较薄弱,所以必须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才能弥补专业知识和治学经验的欠缺,尽快承担繁重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在治学团队中,扮演承前启后的角色。

本科期间,笔者曾经撰写多篇课程论文、读书报告,1965年冬,曾与束景南同学<sup>①</sup>合作撰写一篇讨论“让步政策”的学术论文,并投稿《文汇报》,获得编辑的肯定,因该报转入“文化大革命”,不再发表学术文章,故而未能刊出。经过这些自发的学习实践,笔者对史学研究获得了粗浅的感性认识和治学经验,但却缺乏系统和规范的教育及实践,难以应对专业性的学术研究。之后,多年在中学、师范教学,与史学研究脱节,那点本科期间摸索的治学经验大多淡忘。直到攻读研究生期间,才比较系统学习和从事史学研究,算是迈进治学之门。

## 二

太平天国史是笔者最初进入的治学领域,也是投入最多、用力用功的学术领域。

### (一)《太平天国革命纲领试析》(1980年)

1980年,正值读研期间,笔者撰写的课程论文《太平天国革命纲领试析》,在《安

---

<sup>①</sup> 1978年考入复旦大学哲学系研究生,获哲学硕士,先后在苏州大学、浙江大学任教,教授,博士生导师。

徽大学学报》发表,对学界长期将《天朝田亩制度》定位为太平天国革命纲领提出质疑,论文认为:

农民属于小生产的范畴,不是新的生产方式的体现者,没有理论化的世界观。因此,他们从来没有也不可能自觉、有意识地制订指导自己整个革命进程的总体纲领。他们至多提出一些反映农民愿望和要求的奋斗目标、口号、政策和制度。我们不能轻率地断言其中某个口号或政策是其革命纲领,只有把农民提出的口号、政策和制度等文献材料,与农民革命的整个实践结合起来,认真加以考察,才能揭示真正指导其革命进程的总体纲领。

因此,《制度》被称作太平天国革命的总体纲领并不是洪秀全等规定的。恰恰相反,作为农民运动领袖的洪秀全等没有也不可能有意识地为革命制订一个贯串和指导其全部进程的总体纲领。把《制度》说成纲领是现代历史学家们的论断。<sup>①</sup>

论文指称,《制度》并未公开颁行,鲜为太平天国将士和群众所知,而且“把《制度》作为纲领是经不起实践检验的,因为它并没有指导天国的革命实践,反而为实践所否定”。<sup>②</sup> 论文提出:

《制度》显然是天国最具革命性的文献,浸透了强烈的反封建精神。但是,最革命的文献不一定是纲领,我们不能越俎代庖,把现代人的观点强加给洪秀全等,硬要他们也接受《制度》作为太平天国革命纲领的论断。<sup>③</sup>

因此,《制度》不应被定位太平天国革命纲领。于是,论文重点转向建构新的论述,通过多层次分析和解读,试图提出符合历史真实的太平天国革命纲领:

翻阅并分析研究了太平天国各种文献,考察了它整个革命进程,分析了它

① 崔之清:《太平天国革命纲领试析》,《安徽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

② 崔之清:《太平天国革命纲领试析》,《安徽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

③ 崔之清:《太平天国革命纲领试析》,《安徽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

的各项政策,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太平天国有一个普遍记载于天朝官私文献、并贯于全部革命进程与各项政策的总纲,这就是“废弃偶像,崇拜上帝;诛灭妖朝,创建新朝”的政教合一的革命纲领。<sup>①</sup>

这是笔者公开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

## (二)《太平军初期战史研究》(1980年,硕士论文)

同年,导师茅家琦先生获得学校资助,邀约几位太平天国史专家撰写《太平天国军事史》,共分4卷,后因两位专家相继因故退出,遂命笔者承担第1、3卷的撰写工作。于是,我的硕士论文选题确定为《太平军初期战史研究》,时程是从金田起义到攻克南京。为了撰写论文,我研读了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等军事学理论著作,尝试跳出陈述史学的分析框架,运用历史学和军事学结合的理论与方法,对初期战史中学界未曾关注的三个重要问题展开分析论证,由此构建了论文的论述体系:(1)太平军初期战略方向辨析;(2)战略指挥演变;(3)主要战术特点。这样,硕士论文实际包含了三篇各自独立又相互关联的战史论文。<sup>②</sup>

论文结语提出具有原创性的学术见解:

从金田起义到攻克南京,是太平军战略战术产生和形成的重要阶段。根据战争实际进程,它又可以划分为前后衔接的两个不同时期。

从金田起义到永安突围,太平军在广西中部山区迂回辗转,历经5个战场,转战1年半。除了1个月的突围转移,太平军都处在清军的战略包围之中。由于洪秀全等把求生图存作为战争的重要目的,因此,采取了单纯防御战略,放弃了许多有利的战略发展机会,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战略方向。这种战略导致了5个战场周期性地出现典型的防御战局,防御战成了太平军的主要作战形式。在长期战争实践中,太平军创造了优秀的积极防御战术,多次会战,克敌制胜,粉碎了清军围剿太平军的罪恶计划,保存了这支勇敢善战的反清力量。可是,战略指挥的根本错误和没有明确的战略方向,排斥了战略运动和发展的可能性,堵塞了太平军发展壮大的道路,反清事业遭到严重的损失和多次

① 崔之清:《太平天国革命纲领试析》,《安徽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

② 参见崔之清:《太平军初期战史研究》,硕士论文,油印本,南京大学历史系资料室藏。

挫折。

永安突围之后,太平军实施积极运动战略,确立了若干大城市为近期战略方向,运动战和攻坚战成了主要的作战形式,与此适应,太平军创造了独特的运动和攻坚战术。这种战略战术使清军的军事围剿战略彻底破产,太平军由此进入战略大发展的新时期,反清革命也迅速推向高潮。但是,积极运动战略还存在贪攻大城市的冒险性和较多的流寇主义倾向。

上述分析表明,洪秀全们初期战略指挥的最大缺陷,是忽视了最基本的战略原则: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因此,他们不可能采取正确的积极防御战略,把歼灭清军主力和开辟、扩大基地,有机结合起来。只有各个歼灭清军,才能改变前线力量对比;只有开辟、扩大基地,才能在敌占区建立自己的战略后方,以逐步改变战略力量对比,直到夺取反清战争的最后胜利。比起刘邦、朱元璋,洪秀全等的战略指挥确实稍逊一筹。<sup>①</sup>

### (三)《太平天国战争全史》(4卷,2002年)

由于承担茅家琦先生交付的艰巨撰稿任务,笔者专注太平天国战争史研究,陆续发表了系列论文,写成两卷战史、近百万字的书稿,由此成为太史研究的新兵。之后,因其他两卷的撰稿人因病退出,又奉师命主编这项重要学术工程。笔者立即组织年轻化的专业研究团队,展开第2、4卷的研究和撰稿,花费5年时间和精力,完成了《太平天国战争全史》(4卷)216万字的书稿。接下来,笔者耗费3年,三次认真修订书稿。直到2002年南京大学百年校庆,终于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从1980年撰写硕士论文至《太平天国战争全史》出版面世,历时22年,可谓跨世纪的研究。这4卷著作的“主旨在于全面、系统、翔实地再现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整个历程”。总体论述思路采历时性的纵向思维,以时间为主线,“根据太平天国战略指挥的阶段性特征共分为四个时期,每个时期独立为一卷:即太平军兴卷、战略扩展卷、战略相持卷、天国覆亡卷”。<sup>②</sup>并就各卷论述思路提出具体构想:

就各卷架构而言,根据各时期的战争状况、敌对双方军事部署与态势、战

<sup>①</sup> 崔之清:《太平军初期战史研究》,硕士论文,油印本,南京大学历史系资料室藏。

<sup>②</sup> 崔之清主编:《太平天国战争全史》第1卷,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8页。

略指挥及其变化等因素,全面分析与考量,以时程为基本线索,战场空间为区隔,安排章节。具体战区战场的战史也基本按时程论述。跨战区战场的重大战略行动均以专章论述,分析其对战争全局的深刻影响。这样,各卷展现不同的战争场景,战争双方在相异的时空下互动交错,客观再现该时程中的战争进程,从而在整体上凸显该时程的战略指挥重点和特征,由此厘清太平天国战争的阶段性和变异性。从战争史的撰述设计而言,这是学者深感棘手的难题,也是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sup>①</sup>

《全史》首次运用清朝宫中和军机处所藏的档案文献,注重理论创新和新型分析框架的建构,总体要求是:

以唯物史观为基本理论导向,以实证研究为基础,既厘清战争的客观史实和全部进程,又从军事学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对战局展开新的观察和思考,从而得出前人未发的诸多新见,对提升太平天国战争史的学术层次颇具裨益。<sup>②</sup>

因此,《全史》在文献资料、理论方法、研究路径、论述结构和分析论证等方面均有较多创获和突破,其学术价值获得学界的普遍肯定,获得了江苏省第八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其中,笔者撰稿130万字,集中体现了我在太平天国战争史研究领域的心得和成果。撰稿团队年轻精干,但缺少战史研究经验,理论基础比较薄弱,笔者组织团队认真学习、研讨和实践,从分析框架、论述体系、章节提纲、到文字修改润色,亲历亲为,以确保著作质量。所以,太平天国战争史是我最早涉猎的主要研究领域,也是这部文集选编的重要内容。

#### (四)《太平天国通史》(3卷,1991年)

1985年,茅家琦先生受国家教委委托,“主编一部太平天国史教材”,并“出面邀请江苏省内学者参加这一项集体工程”。接受师命,笔者拟定了全书的提纲,并承担了近半的撰稿任务,约60万字。1991年,这部3卷本的“通史”由南京大学出版

① 崔之清主编:《太平天国战争全史》第1卷,第8页。

② 崔之清主编:《太平天国战争全史》第1卷,第11页。

社出版面世,圆满完成了国家教委托付的任务。其中,全书的《结束语:太平天国革命的历史作用和教训》共4节,笔者撰写了3节,其中,对太平天国运动的总体评价是:

太平天国运动是由社会底层的卑贱者发起地一次对现存封建秩序的正义挑战。他们不仅要破坏不公正的腐败社会制度,而且构想出新的理想社会模式去取代旧的社会。值得注意的是,洪秀全等身处封建社会,却力图摆脱中国传统的改朝换代的陈旧变革模式,建设一个“新天新地新人新世界”。他们标榜要走刘邦、朱元璋之路,选择了用武器铲除封建暴政、建立新朝的道路。不同的是:刘朱依靠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接过了旧王朝的主要遗产,稍加变通,重建新的封建王朝;洪秀全等却试图改变现存社会的经济结构,废除土地和一切财产的私有制,在生产资料 and 所有社会物质财富国有制的基础上,平均分配给人马可资温饱的生活资料,追求“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太平世界。在这种新型的经济结构上建树天王专制的上层建筑,因此,在实践中,采取了许多过激政策,集中表现在对待城市和宗教文化上的暴烈行动。<sup>①</sup>

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不能仅以斗争胜负来考察历史……如果洪秀全重走朱元璋的道路,即使取得改朝换代的胜利,也不能给中国人民带来新的世界。因此,我们不能局限于以成败论英雄的表象考察,而应该对太平天国运动展开深入的理性剖析。<sup>②</sup>

洪秀全等是失败者,但更是一大批立志改造中国社会的开拓者和进取者。他们比同时代的胜利者曾国藩等为历史提供了更多新鲜的内容。比起前辈农民领袖(包括朱元璋),他们是富有朝气和创新精神的集大成者。我们正是从这一重要视角考察和分析太平天国运动的卓越历史贡献。<sup>③</sup>

笔者关注和思考太平天国与农民的关系,并提出个人的学术见解:

① 茅家琦主编:《太平天国通史》下册,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82页。

② 茅家琦主编:《太平天国通史》下册,第282—283页。

③ 茅家琦主编:《太平天国通史》下册,第283页。

太平天国虽然是一次农民运动,但是,它并不代表亿万农民的根本阶级利益。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一批改变社会地位的农民新贵特殊权益的产物。因而它动员和组织农民的深度是有限的,范围也必将狭窄,伴随着强制和胁迫,在农民中产生的社会影响不断缩小,在后期甚至普遍出现不安和冷漠的政治心理。此外,相当多的农民仍处在官绅势力控制和蒙骗下,加入壮勇或团练队伍,与太平军为敌。因此,我们对太平天国与农民的关系应当认真求实地展开多层次的历史考察,既不能否认它的农民运动性质,又要看到它与农民利益的差距。随着天国领袖们的蜕变,运动的农民色彩日渐淡化,差距更形严重……洪秀全等人只是感性地看到农民力量,但宗教迷信和英雄史观使他们把上帝、自己的地位凌驾在人民之上。在神化自己、强化权势集团特殊利益的同时,必然是对人民群众的贬低和蔑视。农民只是他们利用、驱使和恩赐的对象,绝对不是具有完整社会价值的人。因而,太平天国的胜利必然导致运动和农民的分离。洪秀全等不可能和农民以共同的愿望和目标同步迈进,动员和组织农民失去了现实利益整合的基础。农民被遗忘和冷落了,农民运动变成少数既得利益者追求狭隘私利的手段,当然变质腐化,自我孤立。洪秀全等掘毁了天国的基础,只能自食失败的苦果。我们肯定他们动员农民起来推翻旧世界的卓越历史贡献,但不能不同时指出这次农民运动的局限和性质演变,揭示它的非农民性发展趋向。<sup>①</sup>

笔者还从大历史的宏观视角,思考农民和近代社会变革的互动关系,探讨解决近代农民问题的路径,并就此表示:

在近代中国,展开任何社会变革都必须认真考虑和动员农民力量,但是,这不仅意味着组织农民参加变革,更加重要的是着力改造农民,包括物质生活、政治平等和民主、农民意识的转换等系统工程。只有这样,才算真正解决了农民问题,变革才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中国近代化才能出现希望……于是,在农民受剥削和奴役的贫贱地位没有改变以前,中国近代化就永无实现

<sup>①</sup> 茅家琦主编:《太平天国通史》下册,第297页。

之日。<sup>①</sup>

同时,笔者还受命统稿和校稿,并指导两位研究生参与部分校对工作。这部著作影响较大,获得江苏省第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和国家教委第三届优秀教材一等奖。

#### (五)《洪秀全评传》(附《洪仁玕评传》,1994年)

1986年,南京大学思想家研究中心约请笔者撰写《洪秀全评传》(附《洪仁玕评传》),笔者立即请研究生胡臣友、章友德分别参与撰稿。当时,已经有多部洪秀全传记出版,这部传记应体现思想家的特色,而且不宜写成洪秀全思想的陈述和诠释。为此,笔者决意按照结构史的分析框架构建评传的论述体系,评传“导言”指出:

洪秀全思想既是一个动态的流变产物,又有其相对稳定的内在结构。其动态流变则是表现为结构形态的不断运动和变异。因而,研究洪秀全思想必须对其内在结构的层面组合展开静态和动态的辨析。首先,厘清各主要层面的内涵、特征、源流、功能及其演变过程。其次,界定各层面在总体结构流变中的角色和地位,探讨它们在洪秀全思想流变中的作用。复次,考察各个阶段的层面组合,剖析层面间的互动关系,以揭示洪秀全思想总体结构的微观演变。<sup>②</sup>

这是笔者首次尝试运用结构史的分析框架撰写思想家传记。这部新的洪秀全思想传记,为日后持续推进结构史研究积累了经验。在“评传”中,洪秀全思想被视为一个不断流变的结构,基本由5个层面所组合:即(1)主导层面:反清革命思想;(2)淡化层面:平等平均理念;(3)强化层面:皇权主义;(4)宗教神学层面:拜上帝教;(5)新生层面:爱国和反侵略思想。由于各个层面在不同时段强弱消长发生变化,导致洪秀全思想形成变动不居的动态结构。“评传”透过对各层面演变进程和状态的分析,重建了洪秀全思想的结构史。因此,笔者设想:

<sup>①</sup> 茅家琦主编:《太平天国通史》下册,第297—298页。

<sup>②</sup> 崔之清:《洪秀全评传》“导言”,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7页。

在这本《洪秀全评传》中,我们尝试脱开一般人物传记的编年与纪事体例,对传主的主要政治、军事活动和事功业绩只作背景式的简练陈述,从而牢牢把握思想家这一根本环节,把论述重心放在洪秀全思想结构的考察和分析上,在全书篇章结构安排上,思想研究占了4/5,这在有关洪秀全传记中尚属首例。我们觉得,只有这样才凸显出思想家评传的特色。<sup>①</sup>

为了在太史研究路径和范式上有所创新,笔者在战史研究上尝试运用历史学和军事学相结合的研究范式,探索跨学科研究太史的新路径。接着,在《洪秀全评传》第五章,撰写了《三、(太平天国)权力结构与权力斗争的历史考察》,<sup>②</sup>将政治学理论引入太平天国政治史研究,在文献和实证分析基础上,对太平天国政治体制和权力结构展开学理分析与诠释,揭示了从二元结构到一元结构的演变形态,厘清了天国领导集团权力斗争的阶段性进程,跨学科研究有了新的进展。

#### (六) 太平天国史学研究

文革前,革命史观主导了历史研究,太平天国史遂成显学。由于左的思潮泛滥,太史研究深受其害,太平天国评价被人为拔高。随着思想解放,新的史观和史学理论逐渐引入历史研究,出现多元化的评价体系,对太史研究产生重要而复杂的影响。一元化的革命史观受到批评和质疑,学界开始以现代化史观、民本史观评价太平天国,有些学者甚至否定太平天国,出现了“告别革命”的思潮。太史研究因此进入多元化评价时期。面对新的学术环境和挑战,太史学界发生分化和重组,笔者觉得必须对太平天国学术史进行深入和理性的反思与检讨,为此,撰写过数篇论文,其中,2008年,笔者赴韩国参加学术会议,提交的论文《太平天国研究学术史简论》,回顾和论述了150年来的太史研究历程,对主要学术争议作了初步梳理。这样,可以在继承前辈经验的基础上,重新出发,建构新的分析框架和论述体系,将太史研究推向新的阶段。2011年12月,笔者在广州花都召开的纪念太平天国起义160周年学术研讨会致辞提出:

(太史研究)若要有所创新、突破和跨越,比较合理的选择路径是,在太

<sup>①</sup> 崔之清:《洪秀全评传》“导言”,第29页。

<sup>②</sup> 崔之清、胡臣友:《洪秀全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28—241页。

平天国史的分析框架和解释体系上进行新的思考与建构;突破陈述史学的分析框架,构建以历史学为基础的多学科研究的结构史分析框架,同时,结合革命史、现代化史和民本史观等评价体系,建构兼顾文本、实践和绩效的综合性实证性解释体系,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努力撰写一部太平天国史新著。<sup>①</sup>

为了在太史研究路径和范式上有所创新,笔者在战史研究上尝试运用历史学和军事学相结合的研究范式,探索跨学科研究太史的新路径。接着,在《洪秀全评传》第五章,撰写了“三、(太平天国)权力结构与权力斗争的历史考察”,将政治学理论引入太平天国政治史研究,在文献和实证分析基础上,对太平天国政治体制和权力结构展开学理分析与诠释,揭示了从二元结构到一元结构的演变形态,厘清了天国领导集团权力斗争的阶段性进程,跨学科研究有了新的进展。

近几年来,太史研究出现多元评价体系,多种评价各执一端,相互争鸣,见仁见智,缺少交集,遑论兼容并蓄。对此,我在如何客观评价太平天国问题上进行新的探索,2011年8月,在南京召开的纪念金田起义16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词中对评价太平天国运动提出个人的学术见解:

看来,评判一次社会运动,首先,应该回到当时的历史场景,重建运动的基本史实;之后,进行严谨求实的分析论证。就太平天国而言,与各类社会运动相似,它包含三个相互关联与区隔的基本层面:一是运动主体(太平天国领导集团)所设定的理想目标,二是为了实现理想目标所构建的制度,三是围绕理想、制度所展开的社会实践。其中,理想与制度属于领导集团的主观构想,大多留存于太平天国文献,可以通过文本分析和解读加以探究。实践层面贯穿太平天国运动的整个进程,属于天国官方、社会、外部势力等多方互动产生的运动实态,涉及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生活、宗教、文化等多个领域,形成复杂多元的运动轨迹,与理想、制度的主观构想必然产生颇多差异,甚至出现严重悖论,导致实践层面与理想、制度反向而行,对评判太平天国造成诸多困扰和难题,这也是学界出现歧见和争议的重要原因。如,拔高太平天国的学者,往

<sup>①</sup> 崔之清:《纪念太平天国起义160周年学术研讨会》,广州花都,2011年12月27日。